

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略

朱 星 著



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略

朱 星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 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625印张 插页3张 127,000字

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2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011-0072-1/I·11

统一书号：10203·225 定价：2.10 元

星 杰

751

目 次

前言	1
商代甲骨卜辞	10
西周铜器铭辞	13
春秋战国文学语言	17
韵文两大创作	18
周诗《诗经》	
楚辞	
散文的先驱 《尚书》	26
哲理的散文	28
北派各专著	
南派各专著	
历史的散文	40
《左传》《国语》《公羊传》《国策》	
秦汉文学语言	48
文言文	49
《史记》	50
乐府诗 五言诗	56
赋	60
魏晋南北朝文学语言	65

形式美	66
谐隐和拟作	73
个人风格	76
佛经翻译的浅俗文言	79
方法的总结	80
唐宋文学语言	82
近体诗	82
词	95
古文和传奇小说	100
变文和平话小说	103
元明清文学语言	108
戏曲 杂剧、传奇、昆曲、京戏	109
小说 元明四大奇书	118
语言桎梏的明清八股文	128
明清的时调小曲(俗曲)	132
楹联的盛行	137
清末的方言白话报和方言小说	143
清末的新学诗新文体	147
现代文学语言	149
提倡白话文	149
大量采用新词汇	150
采用外国新句法，形成新汉语	150
仿效外国新文体，形成新文学	158
语体文中成语的增加	166
小结	172
附记	175
中国文学语言源流变迁表	

前　　言

大凡中国文学史著作在每一代文学的叙述中，也谈到某一文学创作的语言，但都是附带性地谈及，并没有提到应有的地位，更没有作历史发展的系统阐述。须知语言是文学的媒介，“文学是藉语言来作雕塑描写的艺术”（高尔基《论散文》）。因此不系统地考察文学语言的历史发展，也就不能认识文学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也就不能真正理解文学史。

为了给文学史著作作补充，我在这里尝试把文学语言抽出来单讲，并命名为《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略》，这实际上是指汉语的文学语言发展史。研究汉语语言学的一般只讲文字、语音、词汇和语法等语言体制，不谈文学语言。今人把前者说成语言，后者说成言语^①。因此，我这里讲的既非文学史，又非汉语史，而是文学语言史，故称为中国文学语言史，以示区别。

文学语言一词有四种不同的说法：

1. 指文字的书面语。

^① 这是法国语言学家德索胥尔所分，以为语言分语言 *langage* 和言语 *Parole*。前者指语音、文字、词汇和语法等一套体系。言语即说话，指语言的实践，语言的作业。文学语言讲文体修辞风格等实属言语。

2. 指雅言、通语或民族语。

3. 指文学作品的语言。

4. 指艺术加工的语言。②

其中以第三种是最狭义的，我就是以它为主，再兼用稍扩大的第四种说法，但与第一、二种也有关。讲文学可从没有文字的口头歌谣讲起，但讲文学语言就须从有文字以后讲起，就得从殷商甲骨文开始。至于上古雅言、通语只能从东周春秋战国讲起。而文学作品的语言又包括文体，修辞，个人风格等；而文体中又包括文言，白话，韵文，散文，骈文……。

因此，我从商代说起。那时已有文字：甲骨文。甲骨卜辞已有极初步的艺术加工，但还很粗糙。到金文，文学语言，已较进步。从词汇句法和篇章结构各方面可以看出，但还不脱幼稚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文学语言也适应社会的需要不断向前发展。到春秋战国，由于铁器逐渐替代了青铜器，于是社会处于动荡与激烈的兼并之中，著书立说百家争鸣由之而兴，文学语言也放出了异彩，显然有了很大的进步，可称为它的少壮期。秦汉统一，强调政令统一，要求“书同文”（写同一种字体，即秦小篆），必然又要求“文同言”（文书写同一词汇，即周秦语词汇，这样才能收全国政令统一之效。如果写同一字体而写六国方言词汇，仍是不懂。），因此，“书同文”“文同言”做到了书面语的统一。但“言同音”在全国还做不到，因那时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种种条件不足，直到今天还在推广普通话。但由于秦相李斯颁布标准字书《仓颉篇》，还有赵高《爰历篇》、胡母敬《博学篇》，到汉有扬雄《训纂篇》、贾鲂《滂喜篇》，……秦以吏为师，教学童识九千字乃得为吏。教时不单要识

② 可参看《文学语言讨论集》，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

字形、字义，还要读秦字音。当时六国的贵族文人都能习读秦音，秦音实即周音，所以楚辞中的《离骚》、《九歌》，其韵字与周诗即国风雅颂同一音系，只是夹杂些南方方言词汇。那时已初步做到了字同音，但是在口语中方音仍分歧。李斯所写的文章是标准的文言文，《史记》更是文言文的范文，也是文学语言的典范，一直到清末。在古代汉语中，《史记》已标志着到了成熟期。至于汉赋多数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除贾谊《鵩鸟赋》等是例外。因此阶级色彩很浓厚，如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但还可一分为二，它们创造了一批新的词汇和一些新的修辞手法，这也不能一笔抹煞。汉代在四言诗外又创造了五言诗，如《古诗十九首》以及乐府诗。《陌上桑》《孤儿行》《东门行》，用生动的短剧手法描写了男女爱情和家庭矛盾以及社会失业等，间接暴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而《孔雀东南飞》一诗既是叙事长诗，又是诗剧，更放异彩。由于秦统一后不久败亡，六国子孙对此仇视极深，于是造为流言蜚语，骂秦为暴秦，对于它统一全国并搞“书同文”“文同言”“言同音”（限于读书音，当说字同音）等伟大功业，避而不谈。而且也没有彻底认识到，诸如文言文的形成，书面读音的统一，《仓颉篇》等字书，大大限制了通假字滥写的规范化作用。汉代改小篆为隶书、八分，“书同文”一语已改变了内容。而文言文、字同音，恰恰在此起了作用。这些功业，再加上汉代史书如《史记》《汉书》，是中国最古最大的、有创造性的、文学性很强的史书，再配合赋和五言乐府诗，至唐便形成了西京文化^③的黄金时代。这种西京文化从西周到唐，延续了两

③ 西京文化是我提出的。元以后可称北京文化。统称中国古代文化。而细究具体地分析，当说古代中国文化当以西京文化为核心。至于洛阳，古称东京，洛阳也建过都。但在上古，洛阳文化已与西京文化接近混合了，不能再独立说东京文化。至于南京、南朝时是金陵，骈体声律论就是齐、

千多年(从公元前一一三四年周武王即位始,至公元九〇年唐亡),它是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这是世界人士所公认的。

但是在汉唐中间夹了魏晋南北朝。由于五种异族入侵,引起民族战争,国家分裂,经济大破坏,政治腐败。反映在文化上,由于一批没落的贵族士大夫阶级颓废失望,形成了享乐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语言也走上了歧途,专追求词藻、典故、对偶和音律,内容则空洞消极,毫无生气。但这也可以一分为二。梁刘勰加以总结阐发,写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说明齐、梁的声律论^④,使汉语在艺术技巧上大大提高了一步。到隋、唐统一全国后,才又走上了坦途。

隋、唐好似秦、汉,汉承秦制,唐也承隋制,所以隋、唐主要是唐。秦、汉是西京文化的中兴,而隋、唐是西京文化的极盛。但那时,已到了中古时代。极盛之后必然会起变化,接下去就是元、明、清,以北京为中心,形成了北京文化。而宋代是过渡。^⑤唐代建都长安,仍是西京文化,但它的社会基础已与汉代的不同。唐前承南北朝分裂局面。其时北朝甚是强盛,初由匈奴族刘氏控制,后由鲜卑族拓跋氏控制,统一了北中国,建立了北魏。其先建都在大同,即古“代国”(今山西东境还有代县)。魏书所载北魏鲜卑贵族列传都称“代人也”,因定居在代,所以称代人。魏孝文帝提倡汉化,下令鲜卑族都改说华言,著华服,与汉人通婚。所说华言实即燕、代

梁各朝在金陵兴起的,但势力较弱较小,所以也不能独立为金陵文化。这文化指语言文字和文学。

④ 可参看我的《文心雕龙声律论诠释》;见1979年《天津师院学报》。

⑤ 宋代是过渡,这全是从语言语音转变上说的。

方言。今河北省西境蔚县有代王城，汉文帝封地，汉初属代国，战国时燕、代并称。燕本是周初召公奭封地，国都是蓟，今在北京东有蓟县。北魏初有前燕都鄴，后燕都中山，南燕都滑台，北燕都昌黎，均在河北省，且都是鲜卑族所建。可知那时河北方言已很有势力。到孝文帝迁都洛阳，燕代方言就随之传入。隋文帝杨坚灭北周，从洛阳迁都长安，隋陆法言等编全国读书字音的标准韵书《切韵》是根据历代韵书反切，主要是古洛阳音。而古洛阳音与周、秦音极近。周灭商纣，就命弟周公旦东营洛邑，后来周平王东迁洛阳，所以上古秦洛语极近。到隋、唐后的洛阳，在口语上已变化为北方方言，在上古是燕、代方言^⑥。唐在文学语言上实是历史上一个转折点。在科举诗文上仍袭用切韵，唐韵。只因分韵太多（宋增修《广韵》分二〇六韵）与当时口语距离太大，不得不允许同用、通用，把韵部简化。到宋代词韵全用口语音，压缩为十九韵，就是近代北方音。这个现象可以引起深思。这种书面音与口语音发生大分歧，实由两种不同的基础方言互相竞争兴替所致。隋时统一全国，就有苏谔上书要求正文体，向南朝的骈俪时文进攻。到唐韩愈、柳宗元等正式提倡古文，以周、秦、汉三代的散文为标榜，而一边又在写传奇小说式的文章，如《王承福传》、《毛颖传》、《种树郭橐驼传》、《河间传》等。又在其他散文中，在大创新句新词外，还偶然地采用口语词。但正式反映语体，当以佛教的语录，如《古尊宿语录》为代表。这是因为书面文，古文跟当时口语距离太大，对唐代的经济发展不利（骈俪跟口语距离当然更大了）。在诗词方面，也紧相配合。李白写长短句的古风，白居易写新乐府，刘禹锡写《竹枝》

^⑥ 详见我的《普通话的来历》一文，载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

词》，韩愈、卢仝写散文式的诗。唐人又创造近体诗，尤其是绝句。古本有绝句。唐绝句又是从民歌《竹枝词》等学来的，如“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常建《三日寻李九庄》），“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高适《除夜》），“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江南逢李龟年》），“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司空曙《江村即事》），“那知今夜长生殿，独闭空山月影寒”（顾况《宿昭应》），“日暮数峰青似染，商人说是汝州山”（王建《江陵使至汝州》），还有李白《静夜思》五绝四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全是语体。到宋代文学主体由诗变为词，长短句，更接近语体（唐末已有词，如李白、温庭筠、李煜、冯延巳、韦庄等都写词）。宋末又有平话小说，这是用当时的官话写的。那时的古文也从摹仿周、秦、汉三代而变为接近口语的通俗平易的散文，少用古字、古句法。唐韩、柳所提倡的古文、散文到宋才正式流行产生了。欧阳修、曾子固、王安石和三苏成为古文六大名家，骈文才彻底被打倒。但骈文的尾巴还拖着，它还踞守在公文书章奏的狭窄阵地上，且进一步搞出了四六文长联，恰恰是走上死路的征兆（骈文的阴魂一直延续到清末）。

汉族书面语到隋、唐开始起变化，到元、明、清走入了近代。书面语也随着新方言（指东北方言系北京方言）的崛起而大变化，而古代汉语也开始衰退。五四运动后，古代汉语才完全死亡，现代汉语才正式诞生而逐渐长大起来。元建都在北京。北京在古燕都近旁，位于中国东北。以燕方言为中心的北方官话可称东北方言系。以周、秦方言为中心的北方话称西北方言系，盛行于上古。燕方言直到南北朝始兴。那时的北朝，即北方各地，都在河北省。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实是以河北方言为中心。元都北京以后，更明确了以北京音为标准。北京在河北省，元、明、清三代都建都在北京，

创造性的文学以戏曲小说为主体。戏曲中包括元杂剧，明传奇；小说包括长篇小说，如元《三国演义》《水浒传》，明《西游记》、《金瓶梅》，世称四大奇书。清《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都是用北方官话、语体、白话写的。其中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又是用北京话写的。

文学语言是艺术加工的语言，可见它决不是纯口语，而是口语的提高。它又不能脱离口语，搞成语文不一致。秦代形成文言文，文学语言就开始和口头语分开。从汉赋六朝骈文至明八股文，跟口语距离愈远。文言文本是进步的文体，它能在全国方言极纷歧的情况下暂时做到书面语的统一，后由于手工业、商业、交通的发达，由于北方方言的扩大，就要求言文一致，以利于统一。元建都北京，更促进了这一要求，彻底放弃了文言文，直接用北京口语来写杂剧和小说，初步做到了言、文一致。但在文学创作以外的文章（元诏令就用北京口语并掺杂一些蒙古话），还用文言文。明清，北方官话已扩及全国三分之二地方。清末，虽有人用地方方言写小说，如《海上花列传》用苏州话，还有办地方白话报，外国传教士用广州话、潮州话、宁波话、上海话译写《圣经》，但都失败了。因为北方官话已是最普通流行的白话语体，战国七国时代那种字体纷歧、方言纷歧、言文不一致的局面已不再来。

至清朝被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结束了。五四运动，正式提出了打倒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实际是到全国解放（1949年）后，才正式做到全国学校语文课本、作文练习、文学创作以及政府公文书全用白话语体）的口号。白话文，五四时称国语，解放后称普通话，实际是汉民族统一语，中国的代表语（对外国所用的文书就用汉语，不用少数民族语，这才做到言、文一致。推广普通话，才可做到言同音，音同一致，字音一致。再进一步就是字形一致，即改变表形

表意表音的老汉字，为拼音新汉字，即汉语拼音文字。但哪一天改，道路很长。可见文体改革比文字改革容易。文体改革从文言文改为语体文还较容易，要彻底改革老汉字为拼音新汉字就难了。这暂且按下不说，只谈新汉语的文学语言。新汉语是汉语的新生，也是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青春美盛期。

所谓新汉语，首先是白话语体、普通话。其次是许多新名词，其中有很多是从欧洲和日本译入的，又采用了一些外国新句法，所谓欧化句法。此外，还采用各种新文体，如新诗、新小说、新戏剧等。现代汉语吸收了这许多新鲜血液，使旧的汉语完全改变了颜色，而显得青春焕发，健康活泼。因此，我们不能不称它为新汉语。一般分汉语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但现代汉语中，实际上还分旧汉语和新汉语。旧汉语中用文言文写的不计，我们是指用白话语体写的，如白话小说（方言小说也不算现代汉语）。因此，这些名词，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旧汉语、新汉语、文言文（古文，古文辞）、白话文、语体文、古白话、老白话（包括半文半白）、土白话（即方言白话）、国语、雅言、通语、民族统一语、北方话、北方官话、普通话⑦……都

⑦ 古文辞，为清姚鼐所提出。古文，古来都指古文经、今文经而言。实指古文字。用古文字写的经书称古文经，用今文隶书写的经书称今文经。古文加“辞”为“古文辞”，以示与古文字有别。姚氏所选古文称《古文辞类纂》。

古白话，指先秦的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以及《周易》卦爻辞、《商颂》《周颂》和《书》中较难懂的篇章，都是上古的白话。文言文，是指秦行用的书面统一语，不单字体，而且用周、秦的词汇。通语，指彼此能通晓的语言，不能通晓的才称方言；通晓区域较广的称“大通语”（见扬雄《方言》）。所以，通语与今普通话不同义。北方官话，有二义：一是官场人说的话，实指北京话；一是公共所用的话（官指公，与私对立）。雅言，出《论语》。雅是正、常。雅言是正式话、常用话。又雅即夏，雅言即夏言，即华夏的言语，夏代传下的正统语言。

须分辨清楚，给以科学的界说定义。切忌混淆不清，似是而非。以上是我这本发展史略的总纲。

我叙述的方法是先抓住这条历史发展的总纲，分叙各代各体以及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代表流派在文学语言上创造的特点和成绩，并作历史继承发展规律的说明。其次根据辩证法，一分为二。我主要叙述正面的、进步的，同时也要提到反面的、落后的，加以扬弃。

我又根据内容与形式统一论。历代好的名篇佳作都是情文并茂的。当然要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给其文其人以应有的地位与评价。但内容与形式统一俱佳的很少，其他往往语言艺术很美，而内容很平凡，甚至是有害，如李商隐、杜牧的有些诗。我坚信语言没有阶级性，但有阶级色彩。语言又有继承性。汉语，通过历代劳动人民以及许多语言大师呕心沥血创作优美的艺术作品，更加优美健康。从屈宋起，而左丘明、孟子、荀子、庄周、韩非、司马迁、班固、枚乘、司马相如、曹植、陶潜、鲍照、庾信、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李义山、杜牧、欧阳修、苏轼、辛弃疾、陆游、罗贯中、施耐庵、王世贞、汤显祖、冯梦龙、曹雪芹……他们的作品虽在思想内容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有的还须批判，但在文学语言上创造了很多新词佳句和种种修辞手法，大大的提高了汉语的艺术性。今天，我们学习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除了向群众学习和外国人学习外，也须向古人学习。

商代甲骨卜辞

相传商代前的一些诗歌神话，如黄帝《弹歌》（见《吴越春秋》）、尧《击壤歌》（见《帝王世纪》）、舜《卿云歌》（见《尚书大传》）……，都靠不住，都是后人所捏造或追记的东西。因为那时还没有文字，也不会有那样的语言形式。《诗经》中的《商颂》，《书》中较古奥的《盘庚》篇等，也都是西周史官所追述。其他几篇更是春秋战国史官根据一些古史料而重写的。

商代已有铜器，但铭文极少。所以最早的可信的书面材料还当推殷商甲骨文（在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重一千四百斤，刻工极精巧，但只刻司母戊三字。其他也以一字至五字为多，最长者只“我方鼎”及“収作母辛𠂇”二器，也未超过五十字。可知那时还不以铜器为记录文字语言的主要工具，到西周才大量用之记录语言）。

甲骨卜辞，主要是殷盘庚帝乙时代（上起盘庚迁殷，下讫帝乙徙沫，约二百七十三年之久）的纪录。发掘地点主要是今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一带，称为殷墟，是当时的国都^⑧。盘庚是商汤第九代

^⑧ 甲骨文是一八九九年在河南安阳县西北五里的小屯村地下发掘出来的。原来这地方是殷商的都城。甲是龟的腹甲，骨是牛羊的肩胛骨，较平，均可刻字。这类卜辞等于商代史料。凡商代的帝王世系以及当时的农业生产、狩猎、战争、祭祀等情况都载在里面。甲骨文的数量很大，经过陆续

孙第二十个王。盘庚到纣又有十一王。那时的甲骨文正是代表商代中叶后的文字，已经相当进步，已有形声字，决不是原始文字。用这种文字记录的语言都是卜辞。用龟甲和牛羊骨来占卜，钻孔加灼，见裂纹，取兆定吉凶，就把卜辞刻在甲骨上。字数一般很简短，但其词汇和文法已相当完备。已有复音词，如丁未、丙子、上甲、父丁、人方（邦）、沚或（国）、下上、来岁……。也有名词、代词、数量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介词、叹词，只是没有语气助词。且分单句、复句，还有连动或递动式。代词作宾语而前有否定副词，则代词必倒在动词前。文体是属于卜辞体，后来的《周易》卦爻辞跟它相近。可知卦爻辞可能是西周时改用蓍草后的占辞。

卜辞的文体结构一般分三部分：命辞，占辞，验辞。今引武丁时同一天卜晴雨辞：

庚子卜，争贞：“羽辛丑戎？”（命辞）

贞“羽辛丑不其戎？”王固曰：“今夕其雨？羽辛丑戎？”（占辞）之夕允雨，辛丑戎。（验辞）^⑨

命辞是叙事加问，占辞是答。但也用疑问口气，叙事很少。也可说卜辞是和天神作问答。因此那时的语言，叙事还不发达，问答却很发达。《尚书》中各篇还可看到这些残迹。多数是君臣问答之辞，不再是巫史与天神问答之辞了。

卜辞中间句有许多式，如：

雨？（正问）

不雨？（反问）

雨不雨？（选择问）

发掘，至今已有十五万片左右被著录（据中央研究院《殷虚文字乙编》）。

⑨ 据陈梦家《卜辞综述》。 贞即卜。戎即晴。 羽即翌，指明日。

雨不?(选择问的省略式)

其雨?(正问加重语气)

不其雨?(反问加重语气)

其雨不?(选择问省略又加重语气)⑩

但卜辞还只能算是文学语言的萌芽，它是书面语的开始。因为它体裁单纯，只是卜辞体一种；不用韵；不用语气助词；没有抒情写景和议论，只是简单叙事，篇幅结构简单，一般只一二十字，最长的如《殷虚书契菁华》第二片“癸巳卜贞”只五十字，但这类篇章又极少。

甲骨文是散文，是奴隶社会巫史给奴隶主用龟兽骨占卜吉凶后记下来的卜辞，所以内容多是奴隶主的渔猎、农耕、战争、祭祀等活动。我们相信那时一定有不少奴隶在劳动中唱出有韵的歌辞，可惜没有被刻在甲骨上保存下来。《诗经》上的《七月流火》等诗就是西周奴隶的歌，是用口传传下来的，再由周采风之官记在竹简木札上。这些歌辞是金文韵语的渊源。金文(西周铜器铭辞)的韵语决不是突然产生的。

⑩ 同⑨。

西周铜器铭辞

周初的作品与商甲骨卜辞关系最密切的是《周易》卦爻辞。它是奴隶主手下的巫史用蓍草占卜的筮辞。《左传》上还记着卜和筮并用，但筮短龟长，不如从龟。因为龟卜的历史较古，所以尊卜。筮从竹，可能初用草后又用竹，就把筮辞刻在竹简上。这种筮辞已有较明显艺术加工痕迹，比甲骨卜辞进了一步。例如：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坤卦）

“屯如遂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

“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屯卦）

“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中孚卦）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中孚卦）^⑪

第四条例句可能是东周春秋时的逸诗给后人掺入的。这些筮辞为巫史所收藏，且为巫史辗转抄用，所以得传下。而殷商甲骨卜辞因龟卜法已改变不用，初也由巫史收藏，后就弃置散失，年代久便埋没地下了。

西周的文学语言主要当以西周的金文铜器铭辞为据。它是周王室或诸侯（实是大小奴隶主）刻在铜器上的文字。这些铜器主要

⑪ 与《诗经·小雅·鹤鸣》诗：“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有些关系。